

克莱因
文集

1

Melanie

Klein

爱、罪疚与修复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吕煦宗 等◇译

克莱因
文集

1

Melanie

Klein

爱、罪疚与修复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吕煦宗 李淑珺 陈维峰 甄家明 龚卓军◇译

【中文版导读】

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克莱因被许多学者公推为精神分析史上继弗洛伊德之后，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之开拓最具启发性、最具创意的思想家之一，亦是儿童精神分析之先驱。然而克莱因在专业上的执着，包括她大胆假设、论说当时精神分析尚未触及的儿童精神病理、致力于区辨心智世界的真实与幻想，以及她对于揭开心智世界真理的执着和对于严谨分析技巧之坚持，皆使她在开拓精神分析理论之路上备感孤单。

克莱因于1914年阅读弗洛伊德的《论梦》（*Über den Traum*），随即被弗洛伊德的睿智及其所论及的潜意识心智深深吸引，因而皈依并献身于精神分析（Grosskurth, 1986）。1919年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她以《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 1921）之论文，展开了精神分析的探索之旅。她曾接受过来自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 1873—1933），以及来自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 1877—1925）的个人分析。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对于克莱因的赏识及鼓励，以及克莱因对于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之论点的感动，使克莱因勇于深入潜意识幻想

(unconscious phantasy)的最底层，解读人性中最残酷的面向。

1925年6月克莱因接受琼斯(Ernest Jones)、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和里维埃(Joan Riviere)之邀请至伦敦所作的系列演说在伦敦引起热烈回响，然而这趟快乐之旅却引发了精神分析学界的骚动，挑战与排挤接踵而至。维也纳的分析师们质疑克莱因的发现改变了弗洛伊德所传递的精神分析，而克莱因的支持者则认为克莱因的论点仅仅延展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理论。弗洛伊德辞世之后，两造的争论日益白热化，终于在1941年引发了长达四年的“论战”(King & Steiner, 1991)。来自维也纳的分析师和克莱因的支持者在大战的炮火声中挑灯夜战，争辩关于婴儿期的性幻想、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原欲发展理论与退化的定义、本能冲突论、死之本能的内涵、超我的形成、早期自我的功能与早期超我以及焦虑和罪疚感的来源等议题。根据琼斯的理解，争议的重点在于维也纳的分析师认为克莱因太强调早期的潜意识幻想和“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对于幼儿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克莱因高估了“早期的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而忽略“外在现实”(external reality)。论战在当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佩恩(Sylvia Payne)的协调下，和平落幕。1952年里维埃在庆祝克莱因70岁的新书引言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我已经开启了一些思路，而且丢出了许多建议……未来有一些东西将由它衍生而出”，以此强调克莱因在理论上的延展并未违背弗洛伊德的期待。

论战中所揭橥的许多论点都可在本书中(集结1921—1945年的论文)见到蛛丝马迹，例如性启蒙对于儿童智性发展的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严厉的超我；早期超我的形成与罪疚感和口腔及肛门施虐期的关系，象征能力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以及强调严谨的儿童分析技巧之必要等。相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克莱因在本书中首度提出“修复本能”(reparation instinct)以及忧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的观点，强调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孩童在不同

心理位置的摆荡。

论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时，克莱因引用了费伦齐和亚伯拉罕的论点，但是进一步指出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与罪疚感、俄狄浦斯冲突以及超我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的冲突……是一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的结果。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关于俄狄浦斯的冲突，克莱因承认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而转向父亲，克莱因则认为乳房的匮乏是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主要原因。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之思路下，克莱因阐述了早期严厉超我的样貌。由对于幼小儿童的分析，克莱因发现超我的形成从儿童以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由于婴孩自我（infantile ego）之压制较为强烈，因此在口腔及肛门施虐方兴未艾时所形成的超我，强化了施虐的严厉度。她如此写道：“罪恶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但对屈居弱势的婴孩自我之压制却远较成人强烈许多。”克莱因进一步推论，严厉的超我所引发的焦虑是精神病的基础：“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克莱因1930年的论文强调象征的形成对于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她指出孩童对于性知识的好奇，以及过度的攻击与焦虑阻碍了孩童象征能力的发展。根据克莱因的说法，孩童幻想母亲体内有父亲的阴茎、无数的婴儿和粪便。此时的口腔施虐幻想，使她想占有、盗走并摧毁母亲体内的东西，但是又怕被联合起来的父母亲报复或处罚。以口腔施虐方式内化客体的结果，使小孩也内化了这个历程所引发的焦虑，过度的焦虑使小孩以封闭思考作为防卫，而使小孩失去象征能力。

忧郁心理位置的提出是克莱因对于精神分析的重大贡献之一。温尼考特 (Winnicott, 1962:176) 曾说克莱因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贡献, 可以媲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修复本能的前提之下, 幼童发现令他受挫以及他想伤害的客体也是他所爱的客体, 由于对于修复能力的不信任, 使幼童无法确定他拥有一个好的内在客体, 而处在忧郁心理位置中。

1927年的论文系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在1926年的文章中针对克莱因的儿童分析技巧之批判所提出的反驳。克莱因认为安娜·弗洛伊德混淆了内在与外在现实, 且不敢碰触儿童深处的潜意识幻想。克莱因强调教育与分析不能混淆, 并且坚信只有透过毫不修饰的深入分析, “才能触及孩子们最深层的潜抑经验与固着行为”, 而诠释儿童最深的潜意识幻想是降低焦虑并纾缓病症的最佳预后。克莱因的好友艾利克斯·斯特雷奇有次写信给她的先生说, 要不是克莱因坚持将精神分析与教育分开, 楚德这专业可能永远没有诞生的一天。

克莱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极度敬业的分析师 (Segal, 1992), 传记作者葛罗库斯 (Grosskurth) 也说她是“一位有使命感的女人”。她对于潜意识幻想的深入探索, 多少是其理论被排挤的主要原因之一。葛罗库斯如此写道: “她对潜意识这观念着迷……并将之推到一个弗洛伊德所不敢碰触的深度。” (1986, p.3) 克莱因建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上并进一步推展的发现, 使精神分析技巧在一世纪后, 有了突破及新颖的面貌, 她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巧发展的原创思路, 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全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参考数据

Grosskurth, P. (1986). Melanie Klein: Her World and her Work.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King, P. and Steiner, R. (1991). *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1945*. London: Routledge.

Klein, M. (1921).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Vol. 1.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London: Hogarth Press.

Segal, H. (1964).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elanie Klein*. London: Karnac Book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Segal, H. (1979). *Klei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Segal, J. (1992). *Melanie Klei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Winnicott, D. W. (1962). *A personal view of the Kleinian contribution*. In *The Maturation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2).

林玉华

辅仁大学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副教授

2009年12月

新版引言

1914年，32岁的梅兰妮·克莱因在布达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读了弗洛伊德讨论梦的小册子《论梦》，这成了她毕生志趣——精神分析——的起点。就在同一时期，费伦齐也展开了对克莱因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这一步，似乎部分是为了治疗方面的理由，但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攫获了她的想象。它不仅满足了她巨大的知识好奇心，也满足了她一直以来对于人的兴趣：她希望为了人工作、与人一起工作（原本她计划要攻读医学）。1919年，她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她的第一篇论文。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表现开端，不仅持续到1960年她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也造成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上的重大变革。

她的论文被收集在《克莱因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第一卷和第四卷。她另外还写了《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与《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两本书，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二、三卷。

在《爱、罪疚与修复》中，包含了她从1921年到1945年的论文，呈现她从一开始在作品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如何导向她形成主要理论概念

的论述，也就是所谓的忧郁心理位置（1935—1940）。

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始于儿童。她是儿童分析的开路先锋，发展出分析儿童的方法，甚至可运用于非常年幼的小孩，却不曾偏离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自然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他们一些小玩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联想相比拟。她诠释儿童的游戏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口语沟通。相较于当时其他的工作者，她一开始就采取了严谨的精神分析态度，避免精神分析的过程有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且，她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诠释儿童所呈现的一切，不论他们的感受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在当时，一般人认为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对精神分析师发展出移情，因为儿童还依附着他们的原初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克莱因却发现儿童确实会形成移情，有正向也有负向的移情。她也发现，如果精神分析的场景与态度维持得很好，儿童的移情与成人的移情并没有两样。她坚决主张并证实移情的基础在于儿童将内在世界及其内在意象（*imagos*）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不是将他们对于双亲的感受直接转移给分析师。克莱因论点的特色，让我们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效度，也让我们相信，每一个儿童就像成人一样，不论有多少的阻抗和防卫，都拥有对于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儿童对她简单、直接的方法也确实反应良好。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了解在当时对儿童采取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多么勇敢和充满革命气息。她的作品引发了各方的震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6）、《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 1927）这些论文当中，她描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发现。这些论文同时也处理了当时各种论战的主要论点。她的种种结论所依据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当时所写的《儿童精神分析》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导引出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儿童发展学说，除了对小汉斯的分析是透过督导小汉斯的父亲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于他对成人的分析。克莱因的作品证实了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攻击欲、超我的角色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但由于她直接与儿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许多新发现，并且从某些细节方面补足了弗洛伊德只是大致勾勒出来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这些发现，最终导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所歧异。从一投入工作开始，她就被儿童丰富的幻想生活和内在世界所震撼，这个世界里包含了非常好和非常骇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儿童被坏形象的存在所引发的焦虑，以及被精神病式的焦虑所困。这样的内在世界，可以说是某些先前历史的后果。一个小女孩早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会显示在移情当中。弗洛伊德发现，小孩的动力仍在成人身上运作，而克莱因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婴孩。所以她的结论是，小婴孩从一开始就同时在真实与幻想中形成了强烈的客体关系。她并不认为婴儿是被动的，只受环境所左右，只能够响应环境的影响。她认为婴儿充满了欲望与幻想，与外在的真实经常处于互动当中。由于婴儿的幻想充斥于早期关系中，这些关系于是被内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础。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早期发展的最后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为原初的种种结构所衍生而出的后期阶段。

依据克莱因的描述，儿童的关系首先指向了部分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然后开始分裂为一个非常好而充满了爱的乳房，以及一个非常坏而充满了恨的乳房。这种关系渐渐延展到母亲的整个身体。对于儿童在关于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形成的这种强烈关系，克莱因将之描述为一种具有好奇与爱恨交织心理特质的关系。儿童将母亲的身体幻想为富饶的源头，同时充斥着爱与恨和强烈的好奇。^①她认为儿童想要探索母亲的身

① 在她后期的作品中，她更强调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非强调一个完整的身体。

体，乃是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但由于这些追求知识的冲动链接着原欲和攻击愿望，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便可能导向相关的抑制。

克莱因认为焦虑同时是发展的推动者和潜在的抑制者。对于母亲身体的求知冲动所引发的焦虑，会让儿童将这种焦虑移转到外在世界，并赋予象征意义。但如果这种焦虑太过强烈，也可能反过来导向抑制状态。在此领域中一篇极具指标性的论文，便是出自克莱因之作——《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这是精神分析对自闭症儿童处遇的第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她描述了一种对于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运作，也就剥夺了对世界的任何兴趣。克莱因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对于认知、理智的发展和抑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梅兰妮·克莱因起初试着严谨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表达她的发现，但是与弗氏观点上的某些差异，也几乎从发轫之处就显露无遗。她观察到俄狄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所曾认定的更早，同时，她也不断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极度受到早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她对女性性欲的观点也不同于弗洛伊德。她发现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觉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潜力。而他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主要是一种防卫结构。克莱因对在儿童身上攻击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当时所认定的程度。譬如，她在第一篇会议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3）中，认为象征作用及其抑制基本上是原欲的作用，然而在处理分析材料的时候，她却描述了她对攻击欲的高度关切。在1930年的论文当中，攻击欲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成为她关注的重心。她对于攻击欲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的作品中的观点相映成趣，呼应了弗氏对死之本能和原欲与毁灭力量间之基本矛盾的看法。这种爱与恨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克莱因的作品当中

显得愈来愈重要。

克莱因对于幻想生活的无所不在及重要地位的发现，导致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概念。由于幻想是透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潜意识幻想与象征作用之间的纠结密不可分。她对于象征作用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克莱因1930年发表的论文当中，如其标题所示，她认为象征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定是被给定的，象征乃是透过焦虑的刺激在动态中形成，因此，象征有可能变成畸零形态或是受抑制。

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克莱因的发现无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涵盖，它需要某些崭新的核心概念。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以及《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0）两篇论文里，克莱因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忧郁心理位置。

克莱因在她的临床工作中一贯以焦虑为其线索。她认为儿童同时受到两种焦虑的牵制，一种是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ies），源自于坏的内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种焦虑则源自于罪疚感和害怕失落。但一直要到1935年，她才开始清楚地区分这两种焦虑——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她也一直强调生命的第一年对于后来发展的重要性。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这两种基本的焦虑，在发展上都源自于生命第一年的两个阶段。婴儿在第一个阶段为被害焦虑所宰制，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妄想症固着下来的阶段（就像亚伯拉罕所论述的）。在发展上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婴儿认出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之时。此时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不再只是早期阶段的部分身体关系，而是与整个人发生关系，因而婴儿也会发现坏的形象与好的形象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母亲。这会让婴儿觉察到自己对这样一个形象的爱恨交织情感。随着如此的觉察、明了，婴儿马上会对攻击这位所爱的人产生罪疚感，以及

害怕在毁灭性的攻击之下将会失去她。在幻想当中，婴儿感觉到所爱与所恨的母亲将被摧毁、将要失落，这带来了罪疚、苦恼与失落感。这些感受渐渐会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引发出爱与修复的倾向。

克莱因宁愿说这是不同的位置，而非阶段使然，因为位置这个词指涉到整个组织（organization）的作用、自我的状态、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幻想与防卫。在忧郁心理位置当中所发生的改变具有非常微妙的意涵，它为生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它标志了对于精神现实觉察的肇端，并且也明确区分开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作用状态。克莱因晚期的著作对这些相关的意涵投注了相当的心力。着手引入心理位置这个概念，也标志了克莱因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她开始引用一种崭新的后设心理学架构。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肇始于儿童，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远景。由于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都源自于儿童时期，对于儿童时期的所有发现当然也就与成人的心理学认识密不可分。克莱因也愈来愈倾向于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对于原始心智的发现，以及对于宰制着这些原始心智的精神病焦虑、防卫机制的发现，打开了一条理解严重心理疾病的崭新道路。心理位置此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修复冲动，也提供了我们认识正常的心理发展、升华与创造性的创新观点。

汉娜·西格尔于伦敦，1987

序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已经发行超过大约40年，某些已成书付梓，某些以共同写作的形式成书，也有一些论文首度以论文集的形式问世。当然，她的思想历程就像任何经年累月的创造工作，必然经历持续的开展、补充与厘清。因此，对学生来说，面对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要了解梅兰妮·克莱因最成熟的思想以及她如何得出相关的想法，并非易事。为了这一点，重新编排出版她的全部作品，主要目标便是指出每部作品当中基本论题的位置所在，并透过批注来阐明同样的主题与她早期和晚期的思想有何关联。这些批注放在每一卷的卷尾，但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除外，梅兰妮·克莱因自己在这卷中已经做了批注。

虽然新版全集的主要目标是如此，一旦决定要完成此事，当然也促成了进行某种程度改善的机会：《儿童精神分析》原来以德文写成，它的翻译做了大幅的修订；所有对于弗洛伊德作品较早版本的参照，也修订为参照《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而且所有参考书目也都尽可能修改成最新的版本。此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亦做了新的索引，让它们彼此间可以协调一致、相互参照。

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工作人手，来自许多不同的团体。

艾略特·贾克 (Elliott Jacques) 教授负责与出版商的初步协调谈判，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的编辑玛殊·汗 (Masud Khan) 先生适时提供了慷慨协助，贾克教授也为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写了一篇序。

批注的工作由艾德娜·欧萧尼西 (Edna O'shaughnessy) 女士、贝蒂·约瑟夫 (Betty Joseph) 和我合力所完成。艾德娜咨询了汉娜·西格尔博士，而我本人只是分担责任，并未实际参与工作。另一方面，汉斯·托纳 (Hans Thorner) 在他的儿媳普鲁登斯·托纳 (Prudence M. Thorner) 女士的协助下，加上史蒂芬·史密斯 (Stephen Smith) 博士刚开始的参与，完成了修订《儿童精神分析》译本的工作。同时，托纳也依次把每一章改译的草稿交给原译者斯特雷奇 (Strachey) 女士过目。一篇不曾以英语出现的论文《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 (*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由克劳德·魏德勒斯 (Claude Wedeles) 博士译为英语。安·哈董逊 (Ann Hutchinson) 小姐负责艰巨的任务：统一所有参照书目脚注，芭芭拉·弗礼安 (Babara Forryan) 女士则完成了所有索引的准备、重写与修订工作。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这些朋友与伸出援手的人表达我的感激，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奉献努力，才有《克莱因全集》的发行出版。我也代表赞助这项工作的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 (Melanie Klein Trust) 的信托人，感谢英国精神分析学院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与霍加斯出版公司的合作，业已出版许多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而今再添四卷本的《克莱因全集》。

R. E. 马尼-基尔 (R. E. Money-Kyrle)

引言

梅兰妮·克莱因于1882年生于维也纳，娘家姓莱兹（Reizes），她排行第四，是家中的老幺。克莱因的父母原为犹太裔，但在宗教上已不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他们似乎也包容不可知论。证据显示克莱因从父母双方都得到了许多传承，当然，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因此具有高度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依据梅兰妮·克莱因自己的回忆，她的家庭非常和乐融洽，充满了关爱维系。然而，其中也不乏悲伤痛苦的时刻——她最亲爱的姐姐与尊敬的长兄相继去世。这样的悲剧在许多年之后再次发生——她已成年的儿子因为山难意外死亡。

谈到梅兰妮·克莱因职业生涯的开端，约在14岁左右，她感受到一股强烈想研读医学的欲望，经过哥哥的帮助，她很快就学会了拉丁文与希腊文，进入高级中学。只不过，由于她17岁便订了婚，医学生涯的前景就此打住。她在四年之后结了婚，也就是1903年，并按部就班地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克莱因才能够借由一种新的方式重回她中断的生涯。那时，她偶然间读到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感觉到里面有些是

她过去懵懵懂懂间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然后她到了布达佩斯，让费伦齐开始为她进行分析。费伦齐鼓励她专门对儿童进行分析，于是，她在大战结束前就已经在布达佩斯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以及胡格-赫尔姆斯博士（Hug-Hellmuth）的初步工作之外，儿童的精神分析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后来，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也迅速地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片领域。到了战后的1921年，在亚伯拉罕医师的邀请之下，梅兰妮·克莱因前往柏林，继续她对儿童的分析工作，并且很快地将重要而崭新的概念引入了精神分析中。亚伯拉罕非常支持、鼓励她的创新，同时他也在1924年初到1925年过世之前，为克莱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克莱因在柏林的时候，她先生在瑞典，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幸福的婚姻也在当时画上句点。1926年她应恩斯特·琼斯邀请前往伦敦，琼斯相当支持她，她也就停留于伦敦，渐渐在她的实务工作中开始增加成年病患的比例，特别是为了训练而分析的案例，一直到她1960年去世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弗洛伊德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她也进行了自我分析，因此她出版的作品自然便包括了两方面的分析观察结果：一方面是她的病患，另一方面是她自己，两方面交互核对。

克莱因的临床工作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儿童精神分析必须与分析成人的进行方法一模一样，只不过对于字词联想分析的部分，必须要以游戏分析来补充。她认为移情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借此观察到超我的出现，虽然这只是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她也相信精神分析师不应该施加任何道德或教育上的压力。换句话说，她对小孩和夫人都同样采用弗洛伊德式的移情分析，如果她在后来引入任何的改变，可以说都只是要让移情分析更加纯粹，于是她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限制于诠释工作。她在技术上最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非常倾向于以任何她可以看得到的潜意识幻想为基础，来进行潜意识焦虑的诠释，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会让焦虑不减反增。